

视点

“帝国秩序”在东南亚

文 / 顾树军 王绍光

帝国,是理解东南亚区域秩序的关键,东南亚的历史书写也与帝国密不可分。东南亚和中国的密切关联自不待言,它与西方殖民帝国的联系,是其现代进程的时代背景。而帝国对东南亚地区主导权的角逐,正是“新加坡故事”的大背景。

只有这样,方可理解长期在马来亚地区工作的英国历史学者康斯坦丝·玛丽·藤布尔(著有《新加坡史》一书),为什么没有把现代新加坡历史的起点定在1511年葡萄牙对马六甲的殖民侵占,也没有标注为1965年8月的新加坡独立建国,而是1819年1月30日。这既是因为英国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从这一天开始,也因为新加坡是英国削弱荷兰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的真实起点。

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、宗教文化、人口结构、社会制度和政治架构等内部因素,都受到外部因素的强烈影响。这一影响可分为四个时期,分别是区域内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内生秩序时期、欧洲殖民统治的外生秩序时期、去殖民化时期、民族国家的创建时期。

中国人在上述每个时期的作用都不容小觑。首先,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有三千多万人,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该地区的经济命脉,这样的经济结构当然不会对东南亚的政治发展毫无影响。其次,华人的身份认同也存在冲突,所在国是自己的“政治国家”,中国则是自己的“文化祖国”,这种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,会导致或大或小的认同困境,也会左右自己与驻在国统治集团和社会大众的关系。

16世纪初以前的前现代时期,是东南亚区域内外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内生秩序时期,阿拉伯人、印度人、马来人、中国人是东南亚区域秩序的主要塑造者,而当时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是君主制的王国。

16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的欧洲殖民外生秩序时期,欧洲人成为



1961年11月16日,在马来亚联邦第一任首相东姑·阿都拉曼(左)前往伦敦与英国外长就马来西亚问题会面前,李光耀激动地号召群众团结起来。图片选自《李光耀:新加坡的硬道理》一书。

区域秩序的重要操盘手,政治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帝国,外来殖民者至高无上,本地统治者俯庸其下。殖民帝国为了丝绸、香料、橡胶等商业战略利益来到东南亚,占据有利位置,建立贸易中转站,与东南亚各地形成“中心与边缘”的关系,将后者作为自身机体的供血站。

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,东南亚地区从受中华文明辐射转变为受欧洲殖民者支配,陷入西方国家内部霸权竞争外移所产生的激烈争夺。从荷兰到西班牙、葡萄牙,再到英国、法国、美国,这些霸权首先是军事型、政治强权型的,然后才生发出某种文化型的霸权。只是在英国崛起之后,西方内部的霸权体系才开始有了一些文明的因素,但殖民地

仍为“化外之地”,其政治架构依然严格控制在殖民者手中。

二战后的“去殖民化时期”,东南亚各国成为自身政治秩序的创建者,竭力排斥外来殖民者的势力。殖民帝国既希望全身而退,又谋求以某种方式继续支配东南亚,这才出现在形式上让殖民地复制“宗主国”的政治体系,实质上是想通过行政主导制,保留外交、国防和内部安全大权,操控东南亚的“去殖进程”。

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东南亚新生民族国家的建构时期,区内各国在政治上要求独立自主,经济上却仍然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格局,不可避免地要受经济帝国主义的支配。在这个时期,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

路。缅甸、越南、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家,受苏联和中国影响;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等国家,则更接近英国、美国;泰国保持了君主制的长期传统,文莱也重建成为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。

政治发展往往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,如果一个国家受到的外部因素影响非常大,其内部的自主选择、自我演化的时间和空间就会受到很大限制。对东南亚而言,最重要的外部因素,是旧帝国与新帝国之间的地缘拉锯、冲突与竞争。先是印度、中国这些传统帝国与西欧兴起的新霸权帝国的角力,后是英国、美国、日本与苏联、中国围绕区域秩序主导权所作的较量。而地理位置、经济发展、族群比例、社会结构、贫富差距以及文化宗教等内部因素,也极大地牵动着东南亚的政经走向。

在大国关系主导世界秩序、国际格局的大势之下,小国往往很难保持中立。对新加坡来说,为了防止陷入被强大邻国撕碎的困境,既要加强国防(尽管这样做的用处实际上并不大),又要在防务上依附某个大国,让邻国不敢轻举妄动。

新加坡若想在 中国、美国和英国中间灵活自处,既需要其领导人具有驾驭地缘优势和国家基本制度优势的政治能力,又需要满足同样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,即它带给这些大国的更多是好处而不是威胁。一旦失去这种政治能力,或者让大国尤其是本地区大国感受到威胁,小国的游刃有余自然也就难以为继。

本专题作者顾树军,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,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哲学博士;作者王绍光,现为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、公共管理学院教授,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休教授,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(1990—2000年)。文章内容选自《小邦大治:新加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》一书(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),经作者授权发布,文字略有调整,现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。

皇家园林探秘

畅春园逸虎食人(上)

文 / 阎红柳

据清人钱泳所撰笔记《履园丛话》记载:清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五月二十七日晚,北京雷声轰鸣,大雨倾盆。次日清晨,西北郊的畅春园传来骇人听闻的消息,园内虎圈中有一只猛虎于晚间从笼槛内逃出,与三个相约到前湖赏荷花的太监狭路相逢,形势危殆,两个太监急中生智,纵身跳入湖中,幸免于难,而另外一个则不幸死于虎口。

逸虎食人之后,窜出园外,消息传开,举城震惊。畅春园所处的区域,为清代著名的三山五园,除了畅春园之外,还有圆明园、万寿山颐和园、玉泉山静明园以及香山静宜园等皇帝经常居住的离宫御苑,这里也是皇亲国戚以及侍从,还有值班的朝臣往来和聚居的集中地。换言之,此地奔走来往的多是举足轻重的朝臣或显贵,故而老虎再次伤人,甚至伤及贵人的危险系数极高。况且,该处毗邻西山,峰峦叠嶂,林深叶茂,一旦纵虎入山,围捕困难不说,后患无穷。

逸虎逃窜,嘉庆皇帝急命侍卫追捕。五天后,经侦查获悉逸虎踪迹,又随即下令三额驸(科尔沁扎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希,娶嘉庆皇帝第三女和硕庄敬公主)率众杀虎。诗人张恒润以《杀虎行》记述此事,诗中有云:

风沙满目日晴,观者如堵成无声。遥见虎死近相视,风摇马尾犹心惊。

壮士酒肆曾论兵,男儿自负那敢轻。大言常道世俗笑,今日儿女皆知名。

当时翰林院编修吴慈鹤也写诗留念:

黑河猛将行如风,长枪大槊何豪雄。虎知当死伏不动,翻身一箭穿其胸。

两位诗人尽量真实地再现了逸虎伤人并最终被捕杀事件的始末,尤其极力描述侍卫们围捕恶虎的英勇壮烈场景,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嘉庆皇帝的赞誉和王朝统治形势的自信。

而到辛亥革命以后,近人郭则沅梳理顺治至宣统十朝人所写诗文,尤重以诗咏史,以诗系事的作品,辑录成《十朝诗乘》,吴慈鹤这首诗也被收入,题为《畅春园逸虎食人》。其时清王朝已经崩溃瓦解,郭则沅的看法恰好与吴慈鹤相反,他认为此突发事件非佳兆也,只是预示着某种危机即

将来临。确实,在逸虎食人的当年七月,嘉庆帝举办木兰秋狝,不幸猝死于避暑山庄,似乎验证了那些“后见之明”。

这一恶性事件,不由让人追问畅春园内何以豢养猛虎的问题。据史料记载,畅春园的附园西北门内建有永宁寺,寺西为虎城,是清代皇帝养虎之处。康熙皇帝兴建畅春园,是要在紫禁城之外寻找一处水土清佳之地,作为怡情养性,避喧听政之所,故而对此地的生态环境尤为注重。康熙朝时期,畅春园一带地肥水美,锦鳞游泳,禽鸟翔集,是难得的天然胜地。

其实,帝制时代在宫苑之中豢养虎豹等猛兽的传统,由来已久。据说,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时,曾于玄武门外建虎圈,令禁军训练捕虎。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,西苑、南海子成为明宫廷豢养禽兽的主要场所。

康熙帝建虎城,豢养猛虎,既是宫廷传统的一种延续,也带有君主的个性色彩。康熙帝是历史上出了名孔武有力的皇帝,行围打猎,尤其是亲手猎虎是他津津乐道的美事。康熙帝的宠臣高士奇在《扈从东巡日录》里曾记载,康熙帝曾一日亲射三虎,而当时皇太子年仅九岁,“引弓跃马,驰骤山谷间,矢无虚发,见一虎,射之立毙”,父子相传的高强射虎本领令人咋舌。

庶吉士汪灏曾随康熙帝参加木兰秋狝,《随銮纪恩》一书详细记载了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的夏天,他亲眼目睹的康熙帝猎虎风采。当日,听到负责侦查的侍卫来报,河对岸山上有虎,康熙帝立刻命停御舟登岸,与皇太子两个各持巨枪,立于河岸之上,二十八勇士持枪护立于四周。对岸山谷中传来虎啸的声音,康熙帝命河对岸勇士按照部署猎虎,五名勇士遂遵旨前行,不一会儿功夫,立杀一虎。

不久,康熙帝命众人围观所杀的猛虎,重三百七十斤,“黄毛黑斑,狰狞甚”。康熙帝还告知随从人员,“虎每食一人,其耳必有一缺”。众人前观,此虎耳有数缺,竟已食数人矣。(未完待续)

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,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,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研究员。专治清代学术思想史、历史文献学及皇家园林文化,撰有《清初私家修史研究——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》,主编《海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》《畅春园研究》等。

梦华新录

一代名相“终有悔”

文 / 虞云国

平心而论,王旦(957—1017年)还算是北宋一代名相,《宋史》点赞他:“伟哉,宰相才也。”有一次,他以翰林学士奏事,宋真宗目送下殿时对人说:为朕致太平的,一定是这人。

拜相以后,王旦以俭约治家,有“门庭清肃”之誉;尽管相府里宾客满座,却没人敢以私事干谒;有人受到他推荐,甚至终身都不知荐者为谁。政声如此,也算难能可贵。北宋史料笔记《孔氏谈苑》里说,“外抚诸边,内安百姓,官吏得职,天下富庶,颂声洋溢,且之力也”,尽管有水分,却不至于太离谱。

宋辽定下“澶渊之盟”(1005年初)不久,在佞臣王钦若的怂恿下,宋真宗决定上演神道设教的连台本戏,借以掩饰城下之盟后君主权威的失落,内心却忌憚宰相王旦的态度。王钦若代达圣意,王旦听后仅表态尽力而为。真宗还不踏实,召他人官,君臣欢宴后特赐酒一坛,叮嘱回家与妻儿共享。王旦归府,打开酒坛,见满是明珠,领悟到皇帝想让他即将开演的大戏上不要抗旨。

纵观王旦一生,似也不太看重财货,也许只是圣意难拂的考量,一坛珍珠就此堵住了他的嘴巴,在其后神道设教的连续剧上,他“不复异议”,放弃了做贤相的担当。

一切停当,1008年阴历正月初三,宋真宗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。说去年某月某日夜半,有神人告诉他:“来月正殿做一个道场,将降下《大中祥符》天书三卷。”今日果然奏报天书悬曳在承天门南的鸱尾上。王旦心知肚明,这是事先做的手脚,却带头再拜称贺道:“天赐符命,盛德之应!”

与朝臣随驾前往,内侍取下天书,王旦跪着进呈,皇帝再拜接受,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(故事详见2018年4月2日本报E2版《大儒孙奕斗“天书”》)。

宋真宗趁热打铁,筹划封禅泰山,指望借助秦皇汉武举行过的祭天大典来为自己的权威加分。他哪有秦皇汉武的大功业呢,总得有臣民为封禅请愿吧。这次舆论紧紧跟上,王旦出了大力。他率文武百官、诸军将校乃至藩夷、僧道、耆寿二万四千余人,先后五次上表请求封禅。为了展现请愿的代表性,他把少数民族代表(藩夷)、宗教界代表(僧道)和德高望重的民间人士代表(耆寿),都恰到好处地拉上了。

同年十月,王旦以宰相之尊任封禅大礼使,以天书为前导,扈从皇帝封禅泰山,还奉诏撰写了《封祀坛颂》,历时57天,靡费不计其数,终于为宋真宗圆了念兹在兹的“帝王之盛事”。大中祥符四年,皇帝车驾再往汾阴(今山西万荣西南)祭祀后土地祇,王旦又一次任大礼使,仍受命撰《祠坛颂》。途经陕州(今三门峡市),隐士魏野赠诗王旦:

昔时宰相年年替,君在中书十一秋。西祀东封俱已了,如今好逐赤松游。

诗里讥刺他喑默失责,不谏封祀,规讽他莫再恋位,及早抽身。王旦将诗呈送皇帝,上表辞位,未获同意,便不再坚持。从内心讲,他虽萌进谏之念,但业已赞同,难改其口;也生求退之心,但皇帝厚遇,难拂其意。

大中祥符五年,宋真宗又伪托玉帝传言,称授其天书的赵玄朗是赵家始祖,理应尊为圣祖(赵家先祖,实无此人)。下诏先在外地铸造玉皇、圣祖、太祖与太祖的塑像,再在

京师造景灵宫与玉清昭应宫供奉,王旦任奉圣像大礼使、景灵宫朝修使与玉清昭应宫使,又负责在宫内刻天书而兼刻玉使。

大中祥符七年,宋真宗再赴亳州(今属安徽)太清宫拜谒老子,王旦仍兼大礼使。祥符年间(1008—1016年),所有天书祥瑞、祭祀巡幸、宫观营造之事,王旦都参与其中,兼任莫名其妙的使职之多,让他苦不堪言。最闹心的是,每次大礼,他都必须奉天书随行,令其“恒悒悒不乐”。

宋真宗对王旦礼遇备至,少不了时有赏赐。每见赐物陈列相府庭下,他内心有愧,总闭目叹气:“生民膏血,那里受用得这许多!”也“心知得罪于清议,而固恋得失,不能决去”。退朝以后,他总是冠服不解,默坐静室,家人惶恐不明,问其政府同僚,说一定是想阻止的政事没法实现,而私下忧心朝廷吧。

前面讲到,祥符、天禧年间(1008—1021年),在王钦若、丁谓等鼓动下,宋真宗出于欺蒙本朝人心与耸动敌国听闻的虚骄心理,自造天书祥瑞,配上极具仪式感的大祭典,大巡幸,大庆祝,大建筑,以期达到神道设教的目的,近乎中国版的“皇帝的新衣”。

为演好这场系列闹剧,朝廷不惜“竭天下之财,伤生民之力”,仅东封泰山就耗资费钱800余万贯,西祀汾阴更增至一千万贯。《宋史·真宗纪》评价这场闹剧说:“及澶渊既盟,封禅事作,祥瑞沓臻,天书屡降,导迎奠安,一国君臣如病狂然,吁,可怪也。”

王旦有宰相之才,对大规模、不间断的封祀崇道活动带来的恶果,内心一目了然,但受制于私心杂念,却一无作为,不敢发声。



清佚名画家作品《弘历制虎图》局部。